

周桂钿文集

秦漢思想研究

肆

董学探微

論道

性翎文集

秦漢思想研究

● 董学探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董学探微 / 周桂钿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1

(秦汉思想研究; 四)

ISBN 978-7-5334-6652-7

I. ①董… II. ①周… III. ①董仲舒 (前179~前
104)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3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35553号

DONG XUE TAN WEI

董学探微

周桂钿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 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19号楼 邮编: 350002)

开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5.75

字数 375千

插页 2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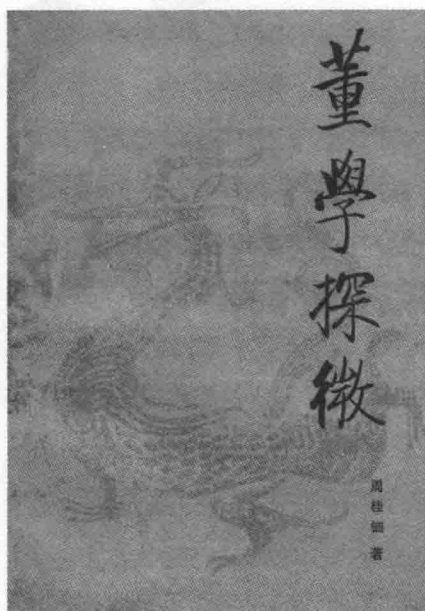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5334-6652-7

定价 79.00元 (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62024258) 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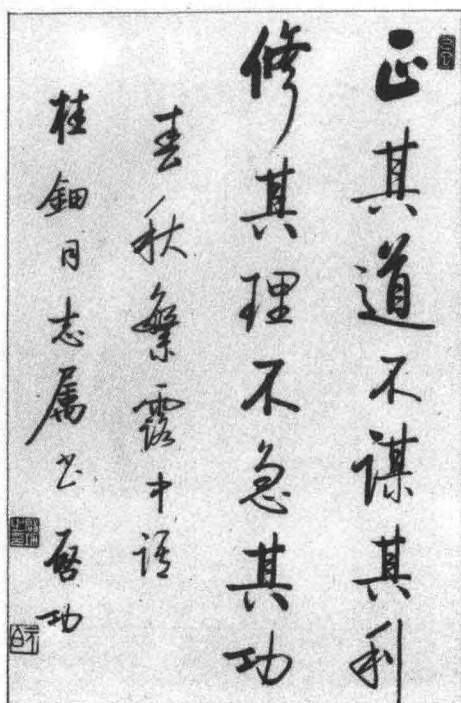
1999年10月7日与何兹全、袁贵仁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际儒学联合会召开的国际儒学大会



《董学探微》初版封面（启功题字）



王安研究院院长授予作者汉学奖



启功题字

序 言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家、哲学家。《汉书》云：“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①可以说他是汉代儒者的领袖。他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尤其深远。

董仲舒的学说是很复杂的，既有粗浅的落后的方面，也有深湛的进步的方面。他宣扬天人感应，讲“人副天数”，显然是穿凿附会之谈，较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倒退了一大步；但他提倡“以仁爱人、以义正我”，虽然作为文字训诂并不切当，而作为哲学观点却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他还强调“必仁且智”，也表现出明睿的智慧。在政治上他拥护大一统，适合时势的要求，又提出“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他没有能够继承孟子“民为贵”的进步思想，他的政治思想还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董仲舒的学说对后世影响较大。宋代理学家程颢说：“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②在中国哲学史上，董仲舒的思想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周桂钿同志研究汉代哲学多年，曾写出关于王充哲学的专著，近又撰成

① 班固：《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1317页，《五行志》。

② 朱高正：《近思录通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第291页，卷十四引。

《董学探微》一书,对董子的学说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董子的仁义学说进行了较详的考释,对近人以“杀”训“义”提出了驳议;特别是《辞指论》一章,揭示了董子关于“辞指”的学说,对于董子的逻辑思想作出了新的阐发。总之,这“十二论”是关于董仲舒思想的系统研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张岱年

一九八七年五月序于北京大学

前 言 (第三版)

这是研究董仲舒的学术专著，这本书的出版前后，我与董仲舒的种种资料打了多年交道。我在研究王充时，开始接触董仲舒的资料，学术界有“王充与董仲舒针锋相对”的说法，理由是董讲天人感应，而王充反对天人感应。我反复阅读《论衡》，没有看到“针锋相对”的内容，只看到王充对董仲舒的赞扬与肯定。只有一处，王充不同意董仲舒的说法，批评还特别客气。学界所谓“针锋相对”只是猜想，没有根据。

钟师肇鹏先生校注《春秋繁露》，我参与此事，校注了其中两篇：《竹林》和《精华》。在钟先生指导下，我在几个月的校注中学到国学研究的基本功，受用一辈子，也为研究董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承蒙张岱年先生与任家麟先生的推荐，我对董仲舒思想的研究获得美国王安研究院首届汉学研究奖。书稿写成，又蒙张岱年先生写序，启功先生题写书名，出版以后获得全国高校学术著作奖。研究王充的著作出版后，我被称为“王充研究专家”。研究董仲舒的著作面世后，我又被称为“董仲舒研究专家”。只有这样深入研究以后，才不容易陷入泛论空谈，才能言之有物。没有资料，不敢乱说；有了资料，要准确解读，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实事求是，是治学的根本，这个求是，就是求真、善、美。由于研究董仲舒，我多次

去河北衡水市的各县考察董仲舒诞生地的文物，参加学术会议，担任董仲舒研究会的副会长、顾问。2013年参加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成立大会，参观了董氏家族的族谱，董氏老人说：以前每年正月十一要到家庙祭祖，男丁都参加，规模大，很隆重。凑巧的是，我也是这一天生日。我不知道这一天是董仲舒的诞辰日，还是董氏哪一个祖先的生日。若是前者，我与董仲舒确有不解之缘。

董仲舒与孔子、朱熹并列中国三大思想家。董仲舒承前启后，是关键人物。孔子生于乱世，朱熹生于末世，只有董仲舒活跃于汉代盛世，被史学家称为“儒者宗”、“群儒首”，因此，董学是盛世文化的代表。过去人们对董学研究不够，中华文化要复兴，要走向盛世，研究董学将成为热门话题，能为现实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

周桂细

2014年5月8日于三枣红楼

前 言 (第二版)

此书出版十多年了，上市两年以后就已经脱销，从来没有重印过。时过十多年，学术界有了很大变化，个人认识也有所提高，原想对本书进行修订以后再版，后来想到此书曾经获得过三次大奖（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研究奖、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著作奖和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改得面目全非，也不合适。现采取两全的办法：原书按原样重印，改正其中个别错字。这本书出版后又发表的有关董仲舒的研究论文作为“董学续探”，共分八章，续在后面。这样既可以看到原来的样子，也可以了解后来认识的发展与变化。还有一些问题，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我也想借此作出回应。有些重要问题，过去未涉及，或者虽然涉及，却未得到充分论述，现在也借再版的机会重写一些论文放在“续探”中，作为补充。学术问题不应该有最后的结论，无论多么精细严密，后人也还是可以提出不同看法的。因为社会在发展变化，时过境迁，理论也是会发展变化的。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经常有考古发现，还有可能从地下挖出从来没见过的新材料。有的人以为，什么都应该有结论，否则就没有意义。我以为，哲学研究的意义就在讨论中，就像体育比赛那样，重在参与。虽然每一次比赛都有胜负，但所有冠军都只能是相对的，下一次比赛就不一定是冠军了。虽然有三连冠、五连冠，

总有“冠”不下去的时候。学术讨论特别是哲学问题的讨论，最主要的作用在于锻炼理论思维、提高思辨能力、完善人格、提升素质；体育比赛主要在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锻炼身体、振奋精神、加强交流、增进友谊。

我的学术路子是从研究王充的《论衡》开始起步的，接着从研究王充思想引出两个相关的研究方向：

一是中国科技哲学。王充研究过天文学，也讨论过天人感应。他用天文学中的“天”反驳天人感应中的“天”，有不少创见。为了弄清楚王充的天论思想，我曾经向陈遵妣先生学习中国古代天文学，并帮他撰写《中国天文学史》中的“古人论天”部分。他的助手认为我写的内容哲学味太浓，删节甚多。我将被删节的内容加以整理和补充，又研究一些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具体问题，写出《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一书，于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对中国古代的天地学说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如对地动、地旋、地游、地圆的区分，对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的重新评价，对两小儿辩日的解释，对中国李淳风风级的发现，对量雨器发明权的实事求是的认定，对雷电发展史的研究，对天人关系的分析，以及对屈原《天问》与柳宗元《天对》的译注，都是有创新内容的。自以为这是哲学工作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比较突出的成果，还纠正了一些中国天文学史专家的某些失误，也算是愚者千虑之一得。中国有“天人合一”的传统，因此，我还想写一本《人体奥秘的探索历程》，作为上书的姊妹篇。为此，我写过一些文章，还特别比较过中西医，尽量寻找中医的长处，用辩证法的观点对西医中的形而上学作出分析批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写《中国传统科学》。中国有没有传统科学呢？古代西方有地心说，中国也有浑天说。至今还在为人治病的中医也是典型的例子。吴文俊教授参考中国传统数学研究现代最前沿的数学，其成果令世界数学界瞩目，曾获国家颁发的500万元大奖。中国传统数学必将从此得到世界数学界的承认和关注。我已经有论文《中国传统的科学及其特点》发表于1999年11月的《学术月刊》（上海）上，这是研究中国传统科学的起点，能坚持走多远，就不好说了。

二是中国政治哲学。王充与董仲舒被学术界认为在“天人感应说”上是针锋相对的。研究王充，自然要涉及董仲舒。研究董仲舒，我写出《董学探微》（1989年1月出版），认为董仲舒哲学，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唯物的，给予基本肯定。同时，我认为他应与孔子、朱熹并列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三大思想家。后来我继续研究董仲舒，于1994年第3期的《福建论坛》上发表文章《董仲舒哲学与西汉政治》，提出哲学是有层次的，最高层次是研究宇宙本原，第二层次是分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伦理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科学哲学等。我认为董仲舒哲学与当时政治关系密切，是政治哲学，属第二层次，其核心是大一统论，天人感应是其理论形式。我在1998年第2期的《船山学刊》上发表拙文《独尊儒术·奠定汉魂——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在题目上明确标出“政治哲学”，并给他定为“政治哲学家”，算是新的结论。关于董仲舒的学派性，公羊学、董学的传授系统，我也进行过不同的探讨。

在以上两个方向的研究过程中，受胡适关于哲学定义的启发，我又提出哲学可以分为三大类：求真哲学、求善哲学、求美哲学。西方哲学以科学为基础，探讨宇宙本原，是以求真哲学为主流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以救世济民为宗旨，探讨社会治理的问题，是以求善哲学为主流的哲学。中国也有求真哲学，东汉王充哲学就是求真哲学，被视为异端；中国也有求美哲学，庄子哲学便是，但也不是主流派。只有孔子、董仲舒、朱熹等是主流派，主流派哲学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学。我从这里得出结论，中国传统哲学是研究社会的政治哲学，与西方探讨宇宙的科学哲学是并列的，各有特色，不存在层次高低之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这是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重点项目，于2000年完成。既然中国传统哲学是政治哲学，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必然与政治理论家、政治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都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政治家如何促进哲学的发展？政治理论家为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他们如何与哲学家配合，为发展中国传统哲学而努力奋斗？这是我今后想研究的课题。

进入21世纪，儒学逐渐升温。我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担任学术委员会主

任，又兼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研究儒学成了我的主攻方向。最近几年，写的文章，讲学内容，撰写书稿，接受电视台采访和给报纸撰稿，几乎都是关于儒学的。我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副会长十多年，现在参加中国哲学史的活动少多了，以上两个研究方向，所投精力也少了。中国需要振兴儒学，人民需要儒学，从“于丹现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任务。有机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就是最大的幸福。研究儒学是理论问题，研究成果要用通俗的语言向人民传播，这是当务之急。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叶选平会长的倡导下，在大家的推动下，2007年10月25日，国际儒学联合会内部成立了普及委员会，张践教授任主任，积极推动普及儒学工作。儒学的复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我们能为这样伟大的事业贡献微薄之力，也是无比光荣的。愿与志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同志们共勉！

周桂钊

2008年3月于三枣红楼

前言 (第一版)

董仲舒约生于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约卒于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时广川县（今河北省景县）人。他是汉代经学大师，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

关于董仲舒的传记资料，主要依据是《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董仲舒传》。他的著作，主要是《春秋繁露》和保存在《汉书》本传中的“天人三策”。此外，还有保存在《汉书·食货志》中的论经济，《匈奴传》中的议匈奴，《五行志》中的讲灾异。唐人编的《古文苑》中也保存着《雨雹对》、《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等重要资料。《艺文类聚》还收有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一首。南宋黄震不解仲舒意，而谓《春秋繁露》非真，今人黄云眉承此说，断定“是书固不仅书名伪而书亦伪矣”^①。从宏观上看，以上资料中表达出一种浑然一体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跟西汉武帝时代的社会状况、科学水平、思维方式都那样协调、吻合，后代的人怎么会伪造得出来呢？至于书名、篇名，可能有错乱的，或者后人加上的，甚至有错简现象，使某些段落似乎衔接不上，还有错漏、遗佚的。总之，以上资料大体上都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信

^①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齐鲁书社，1980年6月版，第303页。

的资料。

董仲舒是划时代的大哲学家，他的庞大思想体系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从宇宙的本原开始，论到天有十端。这十端是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人是自然界的特殊产物，是上天的骄子，有特殊的地位，可以与天地相参。人为什么比万物高贵呢？因为人性高于物性。人性有善质，教而后善。善指什么呢？就是仁义而已。仁是爱他人，义是严于律己。人有两方面的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即利与义。“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比体重要，所以，义也贵于利。由于义利之辨，而有贤庶之分、德才之别。概言之，在于心志，而有“贵志”之说。真物以名，名称是为了标识真实的事物。顺忠臣孝子之情，而生名讳。名以真物，讳以尽情。因讳而有微辞微言，辞后有深指，言下有大义，因而有辞指之分，应不任其辞，务求其指，方可适道。任辞不求指，虽有章句之学，难知圣人之意。圣人之意尽在《春秋》之中。《春秋》有常辞，无通辞。圣人定下一些原则，便是经典，是指导行为的准则，但社会是复杂多变的，准则在实际中要灵活运用，否则，虽是拘守经典，仍然难免背经离道。圣人所定原则多得很，在汉代社会条件下，有两条最主要，那就是中和与大一统。中和是普遍规律，无所不包，天地有中和，社会有中和，人体有中和，人的思想情绪也要中和，以中和治天下，也以中和养身。整个社会是大一统的，思想也要大一统。天下人的思想都要统一于天子，天子要统一于天意。就是说，天下只能有一个思想中心，这样才能使人民“知所守”，“知所从”。

董仲舒认为，一般人很难了解天意，只有圣人最了解天意。圣人的话，儒家经典，都是天意的准确表达。因此，皇帝要禀承天意，就要按照儒家经典上说的办。但是，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不是那么容易读懂的，需要加以研究，才能明白微言中的大义。董仲舒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以提供咨询服务。他不但给江都王、胶西王提供过服务，而且，辞职住家时，皇帝还派使者到陋巷向他请教过。董仲舒对现实社会有深入研究，并有自己的见解。他把自己的见解与儒家经典相附会，再把这些观点当作天意劝皇帝接受，还诚心诚

意地告诫皇帝，如果不采纳这些意见，就是违背天意，那就迟早要招来祸患。实际上，他用圣人和天意把自己的政见神圣化。所谓“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只是他用来推行自己理论的工具，并为后代儒者提供一种向集权者皇帝进谏的手段或方式。在缺乏民权的专制时代，实践证明，这还是可行的方式。历史事实也说明它在许多时候还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说三纲是束缚人民思想的三条绳索，那么，天人感应论则是专为皇帝特制的精神枷锁。

从董仲舒这个思想体系的概况来看，它包括了整个宇宙，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社会的人际关系到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涉及了，其中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法学、教育学等各方面的内容。

董仲舒的思想对后代有广泛的和深远的影响。司马迁认为他是杰出的学问家，《史记·儒林列传》载：“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西汉后期的刘向父子对董仲舒也是很赞赏的，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歆认为：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但他认为，说“管、晏弗及，伊、吕不加”，则大过分了。《汉书》作者认为刘歆说法为妥。从历史发展来看，刘向的评价并不为过。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认为董仲舒“虽无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①，论君臣政治得失，“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②。又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③实际上把董仲舒摆到了旷古少有的圣人的位置上。这与刘向所说的“管、晏弗及，伊、吕不加”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董仲舒由于没有行政权力，在政绩方面远不及伊、吕、管、晏，但在思想影响方面则远远超过伊、吕、管、晏。

①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版，第211页，《别通篇》。

②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版，第438页，《案书篇》。

③ 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版，第214页，《超奇篇》。

中国历史上有三位特大思想家：孔子、董仲舒、朱熹。^①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朱熹是理学大师。经学是汉代的儒学，理学是宋明时代的儒学。这三大思想体系是不同时期的儒学代表，是儒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儒学在发展中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董仲舒使儒学由诸子而成独尊，由一家而融汇百家，在承前启后中起了关键作用。

董仲舒的学说在这么大的国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中国传统观念与董仲舒的学说有很密切的关系，传统观念的积弊和优点，大部分与它有关。但是，应该指出，现在成为思想包袱的一些传统观念，在过去却曾起过进步的作用，而且一些传统观念似乎是应该彻底抛弃的东西，但只要换一个角度，却可以看到它的合理性，因此，略加改造，在现代社会却也能“化腐朽为神奇”，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过去把唯心论当作废物抛弃的时候，没有挖取其中有用的东西，是有教训的。现在，学术界已经在新的思想水平上对历史遗产进行了辩证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思想家：孔子、董仲舒、朱熹，学术界研究孔子和朱熹较多，而对董仲舒的研究则不太充分。因此，我就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董仲舒的学说作进一步研究，并对时贤的看法展开一些讨论，希望能为繁荣学术、探索真理贡献微薄的力量。本人才疏学浅，恳请读者不吝指正！在写作过程中，曾多次向张岱年先生、钟肇鹏先生请教，也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和支持，特为致谢！本书书名也是经与钟先生斟酌商定的。既然有孔学、朱子学，就不应该没有董学。康有为称“董氏学”，皮锡瑞称“董子之学”，实际上已经有了董学。李兆明于1935年在《协大学术》发表以《董学研究》为题的论文，算是正式使用“董学”这个概念。本书的“探微”，只是对董学作进一步的探讨。这一探讨从考证开始，然后分别研究董学各论，最后作总评。

笔者主张，在学术上应该提倡平等争鸣。不管是权威、专家，还是著名学

^① 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吉惠教授认为在孔子之前还有一位大思想家周公（姬旦）。但因年代久远，资料较少，研究不多，没有列入。毛泽东讲历史遗产时也只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大概也是这种原因。